

# 再論整體觀與歷史研究 ——從歷史表象到深層結構

管東貴\*

## 提 要

本文主旨在闡明整體觀對歷史研究的主要意義：它能引導我們去發現「歷史結構」及其運作狀況。歷史結構雖然是一個潛存於社會深層的立體整體性系統，但它的運作動態仍會有社會現象為其表徵。從這些社會現象入手，運用得當，應可找到這樣的系統。本文以滿清政權的興衰及滿族的漢化這段歷史為例，作了這樣的分析。

**關鍵詞：**整體觀 歷史結構 結構範式 歷時回饋 互動系統  
消長對應 異時比較法 因果法

---

\* 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前所長暨退休研究員

## 一、緒 論

「所謂『整體觀』，對象不是那渾然一體的歷史全部，而是指其中的系統；『整體』即是指『系統的整體』而言」。<sup>1</sup>

歷史是『現在』這一時間平面上的全部活生生的社會內容依時間順序向前發展的一個過程；它的特性是「變」，所以它也是一個變遷的過程。<sup>2</sup>傳統史學對這個「變遷過程」的探討，其觀念與方法上的特色是依時間先後的順序來說明歷史事項的「變」；歷史事項的變，主要是它的「消、長」以及它的「分、合、生、滅」等現象。我四年前的那篇文章（見註1），基本上即是依傳統史學的觀點去討論的：在封建制由盛到衰、郡縣制由生到長的全部過程中，血緣組織（宗法制）與政治組織（封建制）的關係漸漸疏遠，從這一全程上去分辨「表面現象」與貫穿歷史變遷全局的「深層道理」。這是從歷史的縱切面上去看的。

傳統史學依時間先後的順序去說明歷史事項的變，通常有兩種方法：一是異時比較法，即對同一歷史事項，以它在不同時間所呈現出的不同面貌，兩相對照，說明其變。二是因果法，即運用因果觀念去究明其變之所以然；這也有先因後果的時間關係。例如，漢初誅諸呂後，朝廷有兩項決議，一是迎代王劉恆入繼大統（是為文帝）；二是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在誅諸呂事件中有功，決議「盡以趙地王章，盡以梁地王興居」。劉章與劉興居都是齊王劉襄的親弟，也是文帝的同父（漢高祖）異母兄（劉肥）之子，即文帝的親侄。按常情常理，叔侄之間應和睦合作，衛護劉家政權，始符合劉邦恢復封建子弟「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史記·諸侯王年表序》）的本意。但文帝三年劉興居起兵反叛。這一事變，司馬遷認為是由於：

始大臣誅呂氏時，朱虛侯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孝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及二年，王諸

1 參看拙文，《整體觀與歷史研究——以中國古代封建制的變遷為例》，頁3，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25期，民國86年6月，台北。

2 參看拙文：(1)《我對「歷史」與「史學」的看法》，《歷史月刊》第2期，頁11-12，民國77年3月，台北；(2)《結構探討法在歷史研究上的時間幅度問題》，頁684-686，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以下簡稱《史語所集刊》）第66本第3分，民國78年9月，台北。

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自以失職奪功。章死，而興居聞匈奴大入漢，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擊之，文帝親幸太原，以爲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於濟北。<sup>3</sup>

從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司馬遷把文帝三年劉興居反叛事件（果）歸「因」於：文帝即位後未依朝廷原議封劉興居爲梁王、封劉章爲趙王，劉興居認爲這是文帝「黜其功」；二年後，待文帝欲封皇子爲王時，始割其長兄齊王劉襄國內的兩個郡來「降格」兌現朝廷原先開出的那兩張「政治支票」。依經驗法則判斷，司馬遷的歸因是正確的。這兩種依時間先後來說明歷史事項之變的分析法，在歷史研究上非常普遍。是史學有別於其他學科的學術特色。

不過，因果分析性的歷史研究對個別事件的歸因，因與果的關係是獨特的。漢初文、景、武三代，宗藩連連反叛，而且每次的反叛事件都有獨特的「因」。這樣找到的因果關係，只是那些個別事件的表象。因爲它無法說明何以宗藩「屢屢」反叛的問題。這問題要從當時的社會政治結構（從現象層面看即是以社會組織爲基礎的政治制度）及其歷史背景上去看才能看出潛存於當時封建制深層的癥結來。劉邦恢復封建制，大封子弟，顯示他生於當時也不知道漢恢復封建制會發生那樣的問題；這是歷史發展「沈澱」下來而潛存於社會深處的一個「結」。<sup>4</sup> 社會結構是一種「橫」的關係，也即不同事項在同一時間平面上的關係。傳統史學卻對這種關係缺乏系統性的認識。<sup>5</sup>

有人拿自然科學中「含數相倚」(Functional dependence)的關係視同因果，

3 引文見台北鼎文書局景印標點本《史記·齊悼惠王世家》頁2010。另參《漢書·高五王傳》頁1997。

4 參看拙文：(1)《封建制與漢初宗藩問題》，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與考古》頁399-402，民國78年，台北；(2)《秦漢封建與郡縣由消長到統合過程中的血緣情結》頁10-15「結論」，《燕京學報》新5期，1999年11月，北京大學出版。

5 拙譯，《史學與社會人類學簡論》（刊於《食貨月刊》復刊5卷2期，民國64年5月），頁83下右：「一個『好的』歷史學家的分析，總是能令人信服的；他所對付的是過去已經發生而不會再變的事情，站在這一地位，他有著一切『後見之明』的方便。不管事情是怎樣開始的，如果把它從進行中予以截住，則他大體可以知道被截住的事情的結局是怎麼成的。可是，如果有其他的因素插入到所截留的那段事情之中，則這段事情會成什麼樣子，那他就茫然無所知了」。這是一個人類學家對史學缺乏橫向的動的系統性認識的一種批評。

認為歷史上也有無時間先後的因果（即：因與果同時並存）。<sup>6</sup>按，所謂「含數相倚」，事實上就是社會科學上普遍運用的「功能相倚」觀念。「功能相倚」在意識上確是沒有時間先後，但有主從之分（如影之隨形）。視「含數相倚」為因果，似以主變項為因，從變項為果。把這種「互動」現象納入因果之列，雖可拓展傳統史學的視野，但意識上也會受到傳統史學中因與果只是兩者之間的關係的局限。「功能互倚」在社會科學中有系統上的整套互動關係，它是通向整體性結構運作的一個起步。把它從這樣的整套關係中割裂下來單獨運用，在方法上，及其原有的整體意識上，都是殘缺不全的。倒不如把「功能互倚」跟「結構運作」整套系統引進到史學中來。歷史既然是活生生的社會向前發展的一個過程，而社會科學又是研究活生生的社會的，則把這樣的系統引進到史學研究中來應是可行的。不過，這立即引發一個問題：歷史橫切面上的系統跟縱切面上看到的消長等系統是否相關？依社會具有整體性的觀點看，這橫縱兩種系統應是有關係的，而且是橫的系統影響縱的系統，而形成為一種立體整體性的互動系統，它反映了歷史系統的全貌。

所謂歷史之立體整體性的互動系統，是指：社會科學上所說的「在同一時間平面上」形成單元而相對穩定地運作的互動系統，此外還須顧到「歷史上有時間深度」的變遷現象。<sup>7</sup>從這樣的「立體性系統的整體」上去看歷史，可以看到傳統史學（以追求兩兩之間的因果關係為滿足）所看不到的東西。本文主旨即在闡明這一點。

傳統史學的研究既然是以尋找兩事項之間有時間先後的關係為宗旨，則它在認知上就很難產生沒有時間先後的「互動」觀念。然而，認識互動是認識歷史事項之消、長等變遷的重要門徑。更確切地說，「互動」是促使歷史事項發生消、長等變遷的根本力量。因為事項的消或長並不是那事項本身自己在消或在長。這可以用一個譬喻來說明：

---

6 參看許 K.S. 著，《史學與史學方法》下冊，頁 99-102，萬年青書廊出版。按，許 K.S. 應即許冠三先生。此書未記出版時地，也未用作者本名，當時在台灣發售似有隱情。我於台北購得此書時所記時間為 1970 年 11 月，其出版時間當在此前。按，「含數」一詞係許先生原文，一般多作「函數」。

7 請參看前註 2 之(2)，文中有詳細的論述。

今有甲、乙、丙三個患胃潰瘍的病人，都到醫院去作檢查。經過一段時期的陸續檢查後，他們去問醫師關於他們病情的問題。醫師拿三個人的第一張與最近一張愛克司光底片比較，看出甲的潰瘍傷口由小變大，乙與丙的潰瘍傷口由大變小。醫師說：甲的潰瘍在惡化，乙與丙的潰瘍在癒合中。病人問：為什麼說我（甲）的潰瘍在惡化？我（乙、丙）的潰瘍在癒合中？醫師把每人的那兩張愛克司光底片拿出來解釋說：甲，你看，你的潰瘍傷口在變大；乙、丙你們看，你們的潰瘍傷口在變小。病人懂了，無話可說。醫師對病人所提問題的解釋，用的即是歷史（病史）辨明法，即同一事項在不同時間所呈現的不同狀況，據以判斷（即前面所說的消或長的變遷）。道理簡明，人人都懂。然而病人家屬再問醫師：為什麼甲的潰瘍會惡化？乙、丙的潰瘍能漸漸癒合？醫師沒有立即回答，他根據專業知識問說：病人有沒有吃什麼藥？家屬答：都沒有。醫師考慮後，認為很可能跟他們的日常生活有關。因為醫師知道，潰瘍傷口本身不可能變好變壞。醫師於是再問：他們第一次檢查後到現在，日常生活上有沒有什麼變化？家屬把病人的日常生活情形告訴了醫師。醫師又判斷說：甲繼續抽煙、喝酒，所以潰瘍惡化；乙戒了煙、酒，丙雖然不沾煙、酒，但經常熬夜工作、三餐無定時的習慣都改過來了，所以兩人的潰瘍都在漸漸癒合。醫師這一次回答的依據是病人的生活史。這番問與答，有兩點值得注意：（一）醫師對病人和家屬的回答，都運用了歷史的回溯，但兩次回答的性質不同；對病人的回答要說明的是「是什麼」，對家屬的回答要說明的是「為什麼」（何以故）。（二）醫師回答病人的問題，依據的是潰瘍傷口在不同時間所呈的不同狀況，這是一種有時間先後的「縱」的關係；回答家屬的問題，依據的是罹病之胃跟所處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受這種互動的影響所產生的累積效果。互動是「橫」的關係，累積效果則是「縱」的關係；換句話說，這包含著「橫、縱」一體的整體關係，而且「縱的累積」是由「橫的互動」所導致。<sup>8</sup> 傳統史學普遍缺乏這種橫縱一體的「整體觀」。

上面的譬喻，內容都已單純化。而歷史的發展，其中牽連的關係是錯綜複雜的。如何從這種「絲團」般錯綜複雜的關係中找出關於某問題橫縱一體的整體性

8 同前註2之(2)。我在該文中已提到「變是緣動而生」的這一基本論點，那是純從理論上說的。現在這個譬喻可以更清楚地闡明這個論點。參看該文「結論」及「附記」。

發展系統來，這雖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但卻是史學上一片廣大的新天地，值得去嘗試開拓。

## 二、互動系統與消長對應

所謂「互動系統」是指有主從互動關係的諸事項（變項），經由「回饋」機制，而形成的一個能維持自調的動態均衡並相對穩定地循環運作的系統。從社會的觀點看，它是由功能互動所形成的一種結構。從歷史的觀點看，它是歷史橫切面上所呈現的一個循環系統。不過，由於歷史是一個變遷的過程，所以這種由回饋機制所形成的循環，在實際運作上其回饋並不發生在同一時間平面上，而是有時差的回饋——「歷時回饋 (diachronic feedback)」。<sup>9</sup>

歷史橫切面上這種循環運作系統中的每一事項（變項），在歷史演進的過程中，大致都會呈現一種或消或長地緩緩發展的現象。這也就是前文所說的「縱的累積」。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消或長的事項往往會有另一事項伴隨著呈長或消的對應發展。也即「長」的事項會有一個「消」的事項相伴隨；「消」的事項會有一個「長」的事項相伴隨。如前面所舉胃潰瘍病患的譬喻中，胃的健康跟罹病是對應而互為消長的。實際的歷史事例，如中國周秦時期，封建制向郡縣制演變過程中，世襲制的消跟尚賢制的長是相伴而對應的，財產公有制的消跟私有制的長是相伴而對應的，傳統禮制的消跟法制的長是相伴而對應的等等。這就是本文所說的「消長對應」。消長對應大致都是「長」的取代「消」的，以繼續維持社會的發展。而消長對應的系統性發展，體現的往往即是源自歷史深層結構的一種脈動或變局。所以，如果我們發現某個時期有數個消長對應的事項在穩定地發展，並發現它們之間呈循環性運作的現象，即可看出其時代變局的大勢來。下面我們拿滿清政權的興亡與滿族的漢化這段歷史來作分析的例子。

滿族入主中國，歷二百六十多年，其盛世堪與漢、唐相比。滿人手握軍、政大權，並亟力維護其民族利益，淪漢族為被征服者；在發現危機時，又曾盡力欲以遏止。何以終不免政權崩潰、民族也融合於漢族之中？造成這種遏而不止的結局，歷史演變的機制在哪裡？

9 同前註 2 之(2)，頁 690-692、695-696。

關於滿清政權崩潰及其民族融合於漢族之中的這段歷史，起先我曾用傳統史學的觀點作過一些分析。後來發現用結構的觀點去分析更能闡明這段歷史中許多現象的所以然。<sup>10</sup>不過，在當時我作結構分析時還沒有把「消長對應」的觀念列入系統中去；而只是從大勢上滿族「消」的一面去看，沒有顧到它跟漢族的「長」在許多事項上都是相對應的。而這種「消、長」多項對應的現象對探索社會的深層結構具有指標性的作用。現在這篇文章對這一點有比較完整的補充。我的主要根據即是前述那幾篇文章中用到的原始資料及論點。另外，由於顧及本文內容的完整性，所以下面的討論，有些內容跟前述幾篇的難免有重複的地方。

明萬曆十一年(1583 A.D.)，屬建州女真的努兒哈赤二十五歲。這一年他的祖父和父親被鄰近部落的人殺害。努兒哈赤向明朝邊吏要求懲兇，不得要領；於是對明朝不滿，並決定自己復仇。不久，他復仇成功，並趁勝統一了建州各部(萬曆十六年，1588 A.D.)。此後，勢力一直擴大。萬曆四十四年(1616 A.D.)，宣告獨立，為後金國，建元天命。兩年後(萬曆四十六年，1618 A.D.)，為鼓動民族情緒，以七大恨告天，誓師攻明。<sup>11</sup>

天命十一年(明天啓六年，1626 A.D.)努兒哈赤去世。子皇太極繼位，仍致力於推翻明朝的志業。<sup>12</sup>但在明朝覆亡前一年(明崇禎十六年，1643 A.D.)皇太極去世。子福臨繼位(福臨即後來清朝的第一個皇帝——順治)；因年幼，由叔父多爾袞攝政。次年，因吳三桂招引，入關，奪得明朝政權，是為大清。

當時滿族人口，據粗估約為八十萬，而明末關內人口約為一億三千萬至一億五千萬之譜。<sup>13</sup>多爾袞顯然知道滿族人口居於劣勢。所以在接到吳三桂的信後即緊急徵召東北地區十至七十歲的滿人(男丁)入關。<sup>14</sup>這已近乎傾族入關的

10 跟本文討論有關的幾篇如下：(1)〈滿族入關前的文化發展對他們後來漢化的影響〉，刊於《史語所集刊》第40本，民國57年；(2)〈入關前滿族兵數與人口問題的探討〉，刊於《史語所集刊》第41本第2分，民國58年；(3)〈滿族的入關與漢化〉，刊於《史語所集刊》第43本第3分，民國60年；(4)同前註2之(2)；(5)〈滿族漢化問題新解〉，刊於《中華文化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中華書局八十週年紀念論文集)，北京、台灣、香港、新加坡四地中華書局同時發行，民國81年3月。按，前三篇用的是傳統史學的分析法，後兩篇用的是結構分析法。

11 參《清史稿·太祖紀》。

12 見孟森，《明清史集刊》，頁209所錄天聰四年(明崇禎三年，1630年)的「木刻揭榜」。

13 參看前註10之(3)拙文，頁448-449。

14 參看前註10之(2)拙文，頁184引《朝鮮李朝實錄》卷45，仁祖二十二年四月庚辰條。

情形。據日人《韃靼物語》的記載，當時湧入關內的滿人水陸兩路並進，「男女相踵，不絕於道」。<sup>15</sup>可見滿人普遍樂意入關。

當時的情形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滿人之所以會如此大規模地湧入關內，除了追求現實利益外，跟自努兒哈赤以來到多爾袞等人都在鼓動民族情緒有同樣密切的關係；滿族的民族重心遂因之移入到了關內。(二)滿人入關時，不僅人口居絕對劣勢，文化也正處在「寄生」於漢人之上的狀態。<sup>16</sup>

由於這種原故，所以滿清政權建立後，透過權力運作，採取了一連串鞏固政權、保護滿族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些是：

(1)為發揮滿人的組織力，把軍政一體的八旗制度移入關內，實行全族皆兵政策。<sup>17</sup>又以京師（北京）為滿人的「故鄉」，<sup>18</sup>分遣滿洲八旗駐防全國各重要地區，<sup>19</sup>死後須歸葬京師。<sup>20</sup>

(2)入關滿人，上則服官、下則披甲，<sup>21</sup>閒散（兵額外之眷屬）也由政府供養。

(3)實行圈地，使近畿五百里以內之地盡為滿人所有，漢人耕種，滿人坐取其租。<sup>22</sup>

15 見稻葉君山著、楊成能譯，《滿洲發達史》，頁 266 引，台聯國風出版社景印，民國 58 年，台北。

16 參前註 10 之(1)，頁 274-275。

17 《皇朝經世文編》卷 35，乾隆十年，御史赫泰〈復原產籌新墾疏〉：「四海之眾，民也；而八旗之眾則兵也」。

18 雍正《上諭八旗》，十年七月初一日諭：「本朝設立各省駐防兵丁，原以捍衛地方，申明武備。其歷來所定規條，俱屬盡善，無可更張之處……乃近日仍有不知而妄瀆者，是以特行宣諭，以覺愚蒙……一則稱駐防兵丁身故之後，其骸骨應准在外殮葬，家口亦應准在外居住。獨不思舟兵駐防之地，不過出差之所，京師乃其故鄉。本身既故之後，而骸骨家口不歸本鄉，其事可行乎？若照此行之日久，將見駐防兵丁皆為漢人。是國家駐防之設，竟為伊等入籍之由，有此理乎？」又，《皇朝經世文編》卷 35，乾隆六年戶部侍郎梁詩正〈八旗屯種疏〉：「查八旗人，除各省駐防與近京五百里聽其屯種外，餘並隨旗居住，群聚京師，以示居重馭輕之勢」。

19 八旗駐防情形請參看《清史稿》〈志 105：兵一·八旗〉。

20 參前註 18 引《上諭八旗》。

21 《皇朝經世文編》卷 35，乾隆五年，范咸〈八旗屯種疏〉：「蓋生民有四，各執厥業，士、農、工、商皆得以自食其力。而旗人所藉以生計者，上則服官，下則披甲」。

22 《皇朝經世文編》卷 35，御史舒赫德〈八旗開墾邊地疏〉：「我朝定鼎之初，八旗生計頗稱豐厚」。又，同前註 18，梁詩正〈八旗屯種疏〉：「查八旗人……群聚京師……而百年休養，戶口眾多，無農工商賈之業可執，類皆仰食於官」。

23 《皇朝經世文編》卷 35，乾隆初，孫嘉淦〈八旗公產疏〉：「查我朝定鼎之初，雖將民田圍給旗人，但仍係民人輪租自種；民人自種其地，旗人坐取其租」。另參前註 18 引梁詩正〈八旗屯種疏〉：「近京五百里聽其屯種」句。

(4)禁止滿人自由擇業。<sup>24</sup>

(5)除了極少數高層人士之間有政治用意的婚姻外，禁止一般滿人跟漢人通婚。

從這些措施上可明顯看出，滿族領導人是想把入關獲得的政權成爲能永續經營的鐵桶江山，並永保滿人的利益。當然，我們已經看到了它的結局。不過，這政權延續了長達二百六十多年，而且締造了康、雍、乾三朝的盛世。有人從這一現象上看，認爲滿清之衰是自乾隆以後。<sup>25</sup>這是從外表看到的現象。從「體質內部」看，滿清卻有民族及文化「基因」上的缺陷（人口居絕對劣勢，表現民族活力的文化也處於「寄生」狀態），其病徵早在入關後不久即已顯露。

滿人入關建立政權後，由於這政權表現出濃厚的民族色彩，而導致漢族內部及滿、漢之間的關係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1)原先明末漢族內部表現在政治上的分裂與對立，漸漸轉變爲滿漢對立；(2)儘管滿族領導人想亟力保護滿人社會的獨特性，但實際上滿漢之間的社會界線漸漸變得模糊；(3)原先滿、漢之間動刀動槍的戰爭變成了「文化柔道」。滿人掌握的是政權；漢人掌握的是文化上和人口上的優勢。在這種情形下進行柔道，滿人文化基因上的缺陷很快就顯露出了症候群的病徵。而且每一種病所反映的民族活力，都有跟漢族成消長對應的現象。下面舉其較顯著的幾項：

24 滿族入關，皆納入八旗編制。除服官者外，皆有當兵的義務，即「上則服官，下則披甲」（見上註21），故「八旗之眾兵也」（見前註17）。披甲者均有一份豐厚的錢糧，足以養家口。然其所以「百年休養，戶口眾多，無農工商賈之業可執」（前註22），並非旗人不願去擇業，而是由於「法制禁令使之無可經營」（見《皇朝經世文編》卷35，沈起元《擬時務策》），因爲他們有隨時聽候政府徵召的兵役義務。如果不如此禁止，任旗人自由擇業，散在各方，當無法徵召應急。正由於這種關係，所以對京旗閒散有很多禁制，以符「居重取輕」之意旨。

25 錢穆，《國史大綱》（民國53年10月，商務印書館，台八版），頁609：「清代自乾隆以後，遂走入不可挽的頹運中」。另參同書第四十五章第一節〈乾嘉之盛極轉衰〉，頁623-627。

滿漢消長對應表

滿	漢
1. 滿人湧入關內，東北漸荒蕪。	漢人犯禁出關不止，東北漸有華夏風貌，土著滿人也樂見。 <sup>26</sup>
2. 滿人入關後不久即發生生計問題；為求享樂，甚至有私典旗地，質當盔甲、器械者。	漢人受理此類典當。 <sup>27</sup>
3. 滿人入關後不久，視披甲為畏途；平三藩之戰時，主帥怯弱。	綠營漢軍驍勇。 <sup>28</sup>
4. 滿人漸棄滿語、滿文，並犯禁參加科場。	漢語、漢文漸在滿人中盛行。 <sup>29</sup>
5. 滿清統治者治道貧乏，不得不變更祖法。	儒道漸為滿清統治者採用。 <sup>30</sup>

其實，凡對滿清政權不利的事，他們都曾一再降旨禁阻，然仍遏而不止。尤其是貧而奢靡的生計問題，成了滿人入關以來的不治之症，幾與滿清政權相始終。

上表是依資料內容作了處理後排列出來的（原資料可依註查看），有彰顯消長「對應」的用意。無論作不作處理，消長的現象總可看出。對這些消長的現象，如果依傳統史學從因果的觀點去理解，則可能產生兩種結果：(1)把它們看作是各有成因的個別現象，進而去追究其個別的原因；(2)從大勢上去看，認為那就是滿族人口少、文化處在寄生狀態下入關取得政權後所產生的漢化現象，終必導

26 參前註 10 之(3)，頁 449-473。

27 同上註，頁 473-475。

28 參前註 10 之(5)，頁 423。

29 參前註 10 之(3)，頁 481-483；又註 10 之(5)，頁 420-421 引《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十四年正月甲諭吏、禮、兵三部及註 53 引雍正《上諭八旗》。

30 參前註 10 之(1)，頁 269 註 38。

致政權解體。<sup>31</sup> 這樣去看雖然並不是錯，但它卻還有無法回答的問題：何以消長對應、多項一致、持續發展？其中是否有共同相關的道理？更重要的是，何以滿清政府對那些消長的發展退而不止？可見在那些消長現象的表層之下，尚有非傳統史學的因果思惟方式所能觸及的問題。其實，這樣的現象和問題正足以作為引導我們從整體的觀點去作考慮，並從表象進到深層而看出它所以然的道理來的切入點。如果我們能從這樣的觀點去對滿族入關前後的發展稍作檢視，就不難看出那些「消長對應、多項一致、持續發展，以及退而不止」的現象，乃是當時歷史橫縱一體之立體整性系統的運作現象，也即歷史深層結構之自主性運作的體現。

從「消長對應」的歷史表象切入到它的深層結構，是本文最重要的一個論點。其所以重要，是因為對歷史上類似的現象，都可以作如是觀。而滿清政權解體與滿族漢化的這段歷史，正是一個可作這種分析的好例子。

表現歷史深層結構最後也是最切要的一步，就是列出「具有時差回饋機制的結構範式 (Structural model)」來，而且所有已知的重要歷史事項都可以用這個結構範式來說明。這一點我過去雖然已經做過了初步的工作，<sup>32</sup> 但那只是直觀的結果；現在則是要將「消長對應」的現象納入結構範式（見下圖一、圖二）中來重作安排。惟這項工作，仍然要從滿清的這段歷史說起。

滿族從鼓動民族情緒，到湧入關內取得政權後，把滿人都納入八旗組織，並使之成為保護滿清政權的鐵衛軍，故有所謂「八旗之衆兵也」的話。<sup>33</sup> 政府所訂對滿人的許多特權及禁制，都是以達到團結滿族、保衛政權為目的的相應措施。

從這些情形上可以看出滿族領導者是：以民族轉變成為武力，以武力保衛政權，以政權保護民族；使民族、武力、政權三者互相依存，而形成為一個互動系統。由於這系統是由維持滿清政權的存在而形成，所以在滿清政權生存的基礎上，它會成為一個具有自主性運作的系統。這也就是具有自主性運作的歷史結構。

31 我在〈滿族的入關與漢化〉〔見前註10之(3)〕一文中，基本上即是依這樣的觀點去討論的。

32 參前註10之(5)，頁424、425，圖一及圖二。

33 參前註17。

前面所列「滿漢消長對應表」中所舉的五條都可歸類到這結構體的三個變項中去：第 1、2、4 條屬於「民族」這一變項，第 3 條屬「武力」，第 5 項屬「政權」。這個互動系統是滿清政權的「生機」所在。滿清政權之所以能維持二百六十多年的統治，靠的是它；但政權解體與民族漢化之所以退而不止也在於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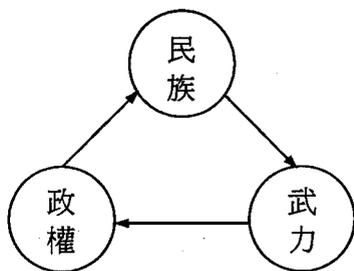
爲甚麼政權解體與民族漢化之退而不止也在於它呢？這仍要從努兒哈赤以來這段歷史的發展上去看才能明白。

從努兒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師攻明，到多爾袞下令十至七十歲男子皆從軍入關，奪取政權，可看出滿洲「民族」是推動這段歷史最基本的力量，也是元始動因的核心。因此，它乃成爲當時歷史結構中的一個強勢變項。不過，它的強勢卻是在朝著向下沈淪的方向發展。於是，結構乃成爲一個逐漸自毀的漩渦。其所以如此，關鍵即在於「民族」這一強勢變項的「體質」太虛弱（人口、文化均居絕對劣勢）。一個民族處在生存競爭中時，文化乃是它所表現出來的活力的總和；這活力是靠每個分子充份發揮聰明才智後的成果所匯積。然而，滿族入關後，「上則服官，下則披甲」，所以絕大部分滿人的聰明才智都被局限在披甲的小天地內，因爲滿清政權如果沒有可隨時動員的武力，就沒有安全保障。滿人發揮聰明才智的天地既然如此狹小，自然無法自文化寄生的狀態下翻身。而這也是一般滿人在生計問題中會出現窮困而奢靡這種奇特現象的根本原因；同時也是民族生存能力漸漸萎縮的表現。民族這一變項既然如此，則以民族爲根源的武力自然會受其影響（如平三藩時八旗主帥畏懼不前，旗人質當器械、盔甲等），而政權的安全性又會受到武力萎縮的影響。結構之如此自主性地循環運作，遂使滿清政權對種種不利的發展退而不止。當八旗武力出現畏懼現象時，滿清領導分子透過權力發揮運用技巧，使綠營（漢軍）忠於滿清政權，以彌補八旗的缺失。這就是「結構」能維持自調的動態均衡並相對穩定地運作的現象。所以表面上還能維持那結構體正常的運作和滿清政權的安全。不過，在這種情形下，滿清政權的命運已不操在滿人手中，它像是處在累卵之上。因爲漢軍一旦有變，這政權就會崩潰。果然，袁世凱一倒戈，清朝就結束了。這時候，滿族的民族重心在關內已有兩百多年，生活習慣和語言也已與漢人融合；而滿族原先的民族發祥地「東北」，滿人人口已不及漢人的十分之一，<sup>34</sup> 兩族融合已是水到渠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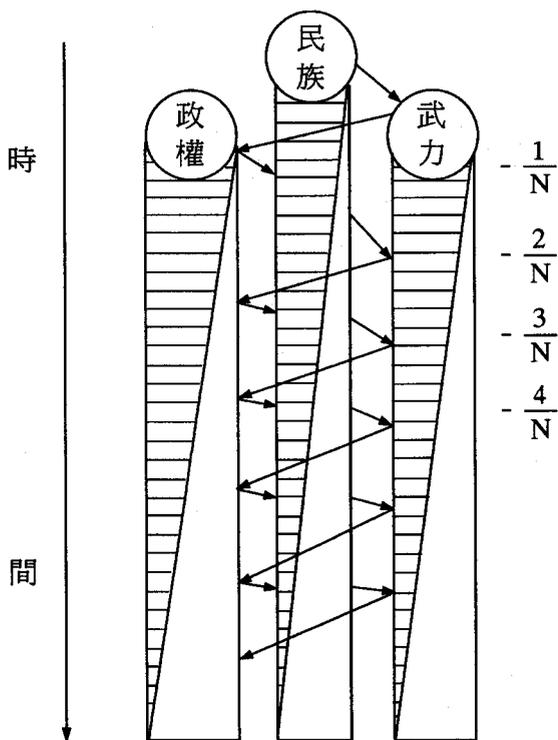
34 參前註 10 之(3)拙文，《滿族的入關與漢化》，頁 458-460。

這段歷史的結構及其運作情形可用下面兩個圖來表示：

圖一 滿清政權興衰史的結構範式



圖二 結構運作示意圖



滿族領導人把整個「民族」轉化成爲「武力」，以「武力」來保衛「政權」，又以「政權」來保護「民族」，如圖一箭頭所示。圖二是標示出時間及其依時遞變（消長對應）的立體整體性結構運作情形；有橫線部分是滿族在消，空白部分是漢族在長。「民族」是促使這結構運作的元始動因，也是強勢變項；經由回饋機制而形成螺旋形的循環運作，因爲每一變項對下一變項的促動都含有時差，所以回饋都不是在同一時間平面上發生。<sup>35</sup>又由於其元始動因「民族」是一優勢變項，而它又是朝「消」的方向變，所以每次回饋每一變項的促動力也在朝「消」的方向變。其遞減的情形用 $-1/n$ 、 $-2/n$ 、 $-3/n$ ……等來表示。其對應的部分則是漢的「長」。所以，從滿族方面看，這個自主性運作的結構，也是一個自毀性的結構。在無法改變滿族人口與文化均居劣勢的情形下，它的「自毀」性命運也無法改變。在滿漢之間由動刀動槍的戰爭轉變成文化柔道後，滿清竟是陷入了自毀性結構運作的命運中，其勢遏而不止。

### 三、結 論

整體觀對歷史研究的主要作用，在於它能引導我們去發現歷史結構及其運作情形。這對於認識所謂的「歷史潮流」大有幫助。歷史結構是一個橫縱一體的立體整體性系統。這種潛存於社會深層的系統，可藉整體觀的指引，從史料所顯露的表面現象入手，把它找出來。

歷史上常可看到消或長的現象；而且常是消長對應地出現。如果看到的情形是「消長對應、多項一致、持續發展，甚至遏而不止」，則由此處入手，必可找到潛存於社會深層的結構，並進而可發現其運作情形。從這深層結構的運作情形上，可以看出該社會在歷史演進過程中許多事情的所以然來；從其消長對應的狀況上，則又可看出歷史演進的方向來。本文以滿清政權興衰及滿族漢化的歷史爲例作的分析，表明了這種情形。

35 參前註 2 之(2)，頁 692。